



我们的共和国丛书

说

道风阳
风阳

振兴卷

中国和平出版社

我们的共和国★丛书

振兴卷

说 道风阳 风阳

谢宜祥 乘舟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爱我中华
建我中华

宋健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
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本书题词

主编寄语

当我们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 50 华诞之际，当我们即将告别 20 世纪，大步迈入新世纪的时候，这套巨型阅读丛书《我们的共和国》出版了。

这套 6 卷集、60 种、1000 万字的读物，是我们献给共和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更是我们献给共和国未来的主人——今日亿万青少年的一片真情。

只有知我中华，才能爱我中华；只有爱我中华，才能献身于中华。青少年朋友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正值花季之年，是青春的富有者。但也正因为青春年少，他们对于我们共和国的过去，了解得毕竟不够多。

为此，我们邀集了上百位专家、学者，组成浩大的写作队伍，在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精心地编写出这套巨型丛书。全套丛书共 6 卷，每卷 10 本。第一卷“奠基卷”，内容为共和国成立前的百年风云；第二至第五卷分别为“缔造卷”“建设卷”“振兴卷”“英杰卷”，内容为建国后的 50 年光辉历程；第六卷“未来卷”，内容为展望未来。历史是无边无际的海洋，60 本书是承载不下这片无际的大海的。因此这套丛书虽然以历史为主线，但并没有采用编年史的方式，而是采用了新的视角，在历史的大海中撷取那些壮阔的波涛、飞旋四射的浪花作为载体，向读者展示共和国半个世纪的惊世风貌。

中小学在校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亿万青少年中，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也有高级中学和职业中学的学生。本套丛书内容丰富，知识辐射面广，虽做不到本本均能适应庞大

学生群体的每一人，但是开卷必有益，读了就会有收获当是无疑的。因人制宜择其内容而读之，也是我们的建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特为本丛书题词，表达了前辈对广大青少年的殷切期望。

广大中小学的校长、老师和家长们，如果你们也认可这套丛书，并且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些指导，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称道的好事。愿我们共同努力，帮助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共和国，热爱共和国，使他们成长为共和国在新世纪的合格接班人。

本书规模浩繁，成书时间紧，虽尽了最大努力，仍难免有差错和不足，欢迎批评指正。这套丛书的第一卷由徐红旗主编，第二卷由程明仁主编，第三卷由戴启铭主编，第四卷由李思德主编，第五卷由唐骅主编，第六卷由尹希成主编。在此，向上述诸主编并向各位编著者致谢。

广大青少年朋友们，在欢庆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庄严时刻，我们衷心希望你们不辜负党和国家的殷切期望，全面提高自身素质，迅速成长为跨世纪的新型人才。到建国 100 周年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将在你们手中胜利实现，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将通过你们的奋斗变成现实。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努力吧，今日青少年！向着新世纪、向着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向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光辉未来，努力再努力！

邹时炎

一九九九年元月

振兴卷

卷 首 语

此卷 10 部，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20 年间的巨大成就。

人们说，当年中国人民唱着“东方红”站起来，而如今中国人民是唱着“春天的故事”富起来。形象、生动、准确地概括了我国这些年来走过的历史道路。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送来了改革开放强劲的春风。春风所到之处，一片勃勃生机。邓小平理论发挥了无比巨大的能量，为中国在新形势下的腾飞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深圳，一个小小渔村，转眼间成了国际型的大都会，成为中华大地上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多年来困扰我们的难题，一道一道迎刃而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适用于我们！打开国门，迎八方宾客！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富强，带来

了繁荣，带来了强大。

这一卷的 10 本书，或许正是从不同侧面，辉映出这 20 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的夺目光彩，传递出中国人民大踏步走向世界先进行列的脚步声。读着这些篇章，同学们心中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兴我中华，扬我国威”的最正确的道路。

香港回归，是这段历史上的一个灼目的闪光点。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运用和宣传，是这段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邓小平，是这一卷中最伟大的人物。

——编者

引 言

中国的农村，走过辉煌 50 年的历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以后，广大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才真正地把中国农村推向了经济腾飞的发展新阶段。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人民政府建立以后，在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将地主拥有的土地，无偿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

1953 年，农村实行合作化。1958 年，中国农村在农业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在“一大二公”的口号下，人民公社不仅规模很大，而且实行“政社合

一”。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分配。这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由于规模大、组织化程度高、能够利用行政权利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农田水利和基础设施建设，便于使用农业机械，致使生产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但由于这种经营体制不适应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脱离了中国农村和生产力水平的现实，加上某些地方推行了一套“左”的管理办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生产上“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也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难以发挥，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民生活的改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到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还有一亿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农村改革就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入手的，并且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被简化为“包干到户”，即在生产队统一安排下，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以家庭为基础，分散劳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形式是由农民自己创造的。

从1978年开始，安徽、贵州、甘肃、广东、河南等省一些生产发展较差的社队为了改变穷困面貌，先后突破“禁区”，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最早实行了这一制度，实现了当年生产大丰收。这一示范效应，使滚滚的农业改革热潮，从小岗村、从凤阳、从肥西，迅速地流向华夏大地，到1980年3月，实行联产承包制的基本核算单位就占农村总数的28%。

1980年5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了安徽省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所引起的变化。邓小平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省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推动包产到户的稳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同时印发了会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于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发展。

到1980年10月，实行各级联产承包的基本核算单位已占农村总数的83.3%，其中实行“双包”的占50.8%。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基本核算单位已占总数的86.7%。

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文件高度评价了在农村这场“牵动亿万群众的深刻而复杂的变革”，指出“它必将给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并对责任制的推行和完善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家庭联产责

任制，也开始由农田向林牧副渔各业及农村经济的基础领域发展。到1982年11月，实行联产承包的基本核算单位已占总数的92.3%。其中实行“双包”的为78.8%。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82年，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的4%。有史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量首次突破了7000亿大关！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使得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成为农村改革中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媲美的奇观。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来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中的工业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由农村各级经济组织和个人举办的，是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农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政策，是从1958年“大跃进”时在人民公社中推行的。当时发展的有农村生产工具的制作和修理、当地工业原材料的开发和利用等。60年代，农村乡镇企业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70年代初，乡镇企业开始复苏，有了缓慢发展，到1976年，社队两级企业生产总值为272亿元。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确定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除经营农业外，也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商业，逐步发展成为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企业。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是国家用法规形式颁布的第一

个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指导性文件，为社队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逐步提高社队企业收入占公社三级经济收入的比重。为了适应家庭承包联产承包的新形势和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新情况，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语中，同意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其范围从过去的公社、大队两级，扩大到乡（区、镇）、村企业、农民联营企业，其他形式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并明确指出，对乡镇企业要热情服务支持，积极引导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4号文件的下发，使乡镇企业迅猛发展，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轮驱动”，“农、工、商、建、运、服”六业齐上的兴旺局面。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达4500多亿元，比1978年增长8倍；在乡镇就业的劳动力8700多万人，比1978年增长2.1倍；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经济总产值的5%以上；1987年我国主要能源原煤产量的31.9%由乡镇企业生产。1979~1987年，乡镇企业提供的非农资金共151.28亿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我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大好形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1980~1990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由2792亿元增长到16619.2亿元，农业总产值由1922.6亿元增至7662.1亿

元。1978年~1990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加，其中粮食产量由30477万吨增至44624万吨，增长46.4%；棉花产量由216.7万吨，增至450.8万吨，增长108%；油料产量由521.8万吨增至1613.2万吨，增长209.02%；水果产量由637万吨增至1874.4万吨，增长185.3%；猪牛羊肉产量由856.3万吨增至2513.5万吨，增长193.5%；水产品产量由480万吨增至1237万吨，增长165.5%。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3.8元增至133.6元，增加了89.8元，年均增加3.1元，而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29.8元。在总农户中，困难和特困户减少，富裕和小康户增多。1978~1990年，人均200元以下的农户由82.6%降为1.4%；人均500元以上的农户由11.6%，上升至57.4%。其中500元~1000元的富裕户为42.3%，1000元以上的为15.1%。尤其令人振奋的是，一个个令人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华西村、刘庄、南街等，在华夏大地上冉冉升起。



说
凤
阳

道
凤
阳



引言	1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	1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	6
渔村首富——南隍城岛	27
侨乡首富——美岭村	35
中原首富——刘庄	40
崛起的南山集团	70
王廷江和沈泉庄村	80
奇异的南街村	98
共富之村——明月村和山河村	125
长白山的脊梁——东关村	133
回民亿元村——中沙海村	141
一步一层天——寨郝村	146
今日厉家寨	152
九间棚的故事	158
穷山窝里新愚公	166
金刚寨人的志气	182
王石门场村致富四部曲	191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

安徽省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以凤阳花鼓出名。而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后，凤阳不仅没有富起来，相反越来越穷。凤阳人讨饭就同凤阳花鼓一样，闻名全国。有一首广泛流传的凤阳花鼓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几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因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而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就隶属于凤阳县。小岗村虽然很小，1978年，全村仅有18户人家，115口人，全村共有517亩耕地和10头牛。但也像凤阳县其他乡村一样，“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穷到了极点。据1979年底凤阳县委公布的账目：1966年到1978年，总计156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87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11.4万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济钱1.5万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十分之一。尤其令人刻骨铭心的是“大跃进”以后那3年，小岗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是无可果腹。175条生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39个人和一头牛，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除长江、黄河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树叶凋落。由于秋季无收，秋后大批灾民离家乞讨，凤阳人再度“背起花鼓走四方”，小岗人又一次面临死亡的危险。

1978年12月28日，是一个让小岗村农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被贫困、饥饿折磨得难以再忍受的小岗村人急红了眼，生产队长严俊昌偷偷把全队18户人家的户主召集到会计严立华家。屋内气氛异常，劣质烟草味扑鼻而来，这些饥肠辘辘不时打着寒噤的村民们，紧急而

又秘密地商讨着如何度过饥饿这一难关。

严宏昌，严俊昌的堂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也是小岗村惟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这个农民用他所学到的最简单的加减法即可计算出，20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村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500公斤减少到50公斤，小岗人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求生的本能，使严宏昌率先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干脆实行包产到户，自己救自己。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了，因为多少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他们是一清二楚的。“敢”与“不敢”，颇使他们费了一番斟酌，直至天明，他们终于下了决心，生产队长严俊昌说：“如果大家能答应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产到户。第一，夏秋二季每户打的头场粮食就要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的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第二，我们是‘明组暗分’，不准对上级和外村人讲，谁讲谁不是人。”而后，有位农民说：“我再加上第三条，会后如果队长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坐了班房，他家的农活我们全队包下来，他家的小孩全队养。”

根据大家的意见，严宏昌郑重地写下了一份合同：

1978年12月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